

收稿日期:2022-05-07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及其在新时代的回响

向前敏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景提供了向度,为解决当前世界重大的具体现实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致思方式和理路,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指明了路向,在今天仍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辩证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生存状态异化的深刻反思、对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整体把握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萌生的历史原点。古希腊哲学的文化因素和现代西方的历史现实和逻辑,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思想,卢梭公意共同体理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共同体主义转向”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发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和超越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共同体思想内涵,而且在新时代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关键词: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6-0001-09

作者简介:向前敏(1996—),女,贵州黔西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6.074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875}。面对世界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局性视角出发,坚定“只有联合、团结合作才是最有力的武器”的信念,并不断将其践行到具体活动中,人类才能跨越全球性危机“峡谷”。就国内发展而言,“不平衡发展”作为制约民族整体利益实现的掣肘因素,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这一难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全民族整体利益置于第一地位。此外,面对世界性和地域性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和国内场合呼吁全世界人民要一道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理论主张无疑深受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启发,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回声。因此,回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在深层根基上发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源起,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更是在前人思想历史性的基本要素中去充分挖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价值,进而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发的历史原点

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共同体状态^[2]。因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见之于其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其独特的原生语境,规定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现实运行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辩证分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进行肯定分析和否定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3]183},这是其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否定性分析后,对共产主义何以到来作出的科学规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文明。“工人生产得越多得到的却越少”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经济事实”,这一事实反映“剥削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独有特性,这一特性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命运,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文明作为一种剥削性、对抗性文明,具体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与资本相对立。剥削和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3]172}。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作出否定性分析,厘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对抗和剥削的现实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由这一矛盾推衍其必然结果,即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资本主义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使共产主义从理论设想变成现实可能。

共产主义的实现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裕和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为前提逻辑,这一判断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文明进行肯定分析后,对共产主义何以实现作出的条件规定。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是一个葆有“新”特质的现代性逻辑,这种逻辑有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具体表现为肯定个人的现实追求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的满足得益于资本主义工业和技术文明的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攒。资本主义这一发展现实,不仅为承认和保障个人的利益追求提供物质前提,更为现实化共产主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基于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为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创造了各种物质条件,奠定了把现存的条件变为联合的条件的基础,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存在于以往全部社会财富之中。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现实作辩证考察后提出的全新社会形态构想,其包括“理想”和“现实”二因素,二因素都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文明作出肯定和否定分析后得出的科学判断。然而,马克思更强调从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消极方面去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实体——资本,它支配着社会本身,具体现实化为对现代人生存时间的占有、生活方式的规定,并在规定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偏离人类种族繁衍、情感需要、家庭维系和社会稳定等自然选择的异化现象,进而使现代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生活创造性和生命完整性。基于此,构建一种纠正上述“偏离”的全新社会形态理论、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的现实背景。

其次,出于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异化的深刻反思。任何理论概念的提出,背后都蕴涵着某一社会问题的提出;任何社会问题的提出,都表明人的生存状态发生异变。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异化的关照和反思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的“人道因素”。“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11},对人的关注是马克思从事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理论主题,“人本身”是马克思研判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解释性原则。马克思对工人命运的深刻关切,不仅仅诉诸对工人悲惨境遇的表象事实的朴素描述,更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运行逻辑和发展逻辑,寻探出造成“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的内在根本因素,即资本理性精神。在这一精神奴役下,资本主宰社会生活,使包括资本家在内的现代人与时间、空间和物界等领域相异化,这一异化状态具体展开为现代人在时间中失去自主选择的

能力、对生活场所产生冷漠和排斥、丧失把被生产与消费的物作为人的本质的外化形式的的能力。

马克思从工人的实际生产活动中来理解工人的异化现实,进言之,从工人受剥削、压迫的现实生产活动中把握工人物化、异化的现实前提。工人自身的异化现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文明的必然产物。自工业革命以降,以先进大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化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但在对财富的直观理解——财富即商品的理解之下,机器技术不仅是帮助现代人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更使人发生了内在的变化:人设定的目的本身成为技术的产物,机器成为超越人、统治人、物化人的背反存在,物成为支配工人的绝对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逻辑”加持下,人的生存本能和生活欲望不断被放大,这一方面造成资本家把资本视为最纯洁的圣物,把商品作为其肯定、标识自我的方式和手段,成为被物质牧饲的人;另一方面造成工人“理性地”选择从属于资本,抑或有限地反对资本,进而为资本家生产财富、给自己生产贫穷。

在资本主义异化社会,工人对时间和空间的经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存时间空间化”和“生存空间时间化”是工人生存结构发生异化的主要形式。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以自由自在的生产活动理解自我、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中来把握自己的方式被遮蔽,人的价值取向被资本价值体系掌控,进而造成人性物化和人的财产和所有权丧失、人沦为生产机器的异化现象。换言之,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基本架构,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和人的异化。直面资本主义异化现实、聚焦工人自身生存异化现状,为探寻消解异化的现实可行路径,马克思给出了治理药方,即树立“共同体”意识、建构“共同体”理念和践行“共同体”原则,把“共同体”作为解决现实矛盾的重要策略和原则,作为一切生产和发展的前提逻辑。概言之,对现代人异化状态的反思和消解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的又一历史来源。

最后,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把握。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循环封闭的静态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动态过程理论表征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把生产关系作为区分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参照标准,提出人类社会是“五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动态社会。为规避“见物不见人”的理论缺陷,马克思不仅从“物”的角度阐释人类社会的动态发展进程,而且也从“人”的维度阐述人类的动态性历史。马克思从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描绘了人类社会的非静止状态,呈现了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致力于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追求达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共同体社会的动态事实。换言之,人类社会历史的流动性,具体展开为“物的依赖性”历史阶段已经超越了“人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现正致力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超越“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依据不同标准划分的人类社会“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是从总体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视角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作出的科学概括和预判。从理论表述上看二者存有较大差异,但深入理论自身内容考察,此二种划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表现于二者相互对应。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换言表述;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异语表述;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同意语词。对“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关注是马克思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形态嬗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研究私有财产或私有制,不是简单地以论证资本主义何以消解为目的,更是为了解决共产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私有制的研究阐释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为何解体,表明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何以形成,为论证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何以到来提供理论支撑。

正是基于对国民经济学不加反思的前提即私有财产的历史起源的追问,马克思以辩证的方式科学地把握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揭示私有制和人异化之间的本质联系,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命运,进而逻辑地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切都颠倒了的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颠倒了生产的根本目的,将满足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颠倒为实现资本增殖的生产;另一方面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即以物的方式实现人的逻辑,将人与人的关系内置于物与物的关系中,人的关系从属于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了的社会,直观表现为劳动本质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状态下走向其反面,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生命结构和生活形式单一化,人成为单向度成长的人。更进之,在私有制社会,一方面存在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相背离、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呈现紧张之势,人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面临不可调和的现实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历史趋势。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设想直指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作整体把握后得出的可行性设计。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发路径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其自身的统一性特点,是独立可区分的诸因素的统一,是差异性的统一,这体现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具有古希腊哲学的文化因素,又具有现代西方的历史现实和逻辑。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共产主义因素,卢梭的公意共同体和德国古典哲学“共同体主义转向”三者内在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预设。

首先,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共产主义因素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奠定了哲学逻辑。把握马克思和古人的思想联系是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缘起的重要向度。从“文化根基回溯”的维度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遵循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传统,理论预设的共产主义社会源于古希腊文化或古典文化对马克思的影响。具体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共产主义因素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前身”。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的规定,二者分别标识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独特扇面,成为马克思规定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参考依据。

第一,城邦共同体思想蕴涵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柏拉图开辟了欧洲文化的超越性视角,是一个指向现代激进思想的早期指示器。柏拉图的超越性理论思维方式体现于其理念论。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善”是客观的、给定的、普遍的和永恒的政治原则,是完满的超越性存在,即是现实存在、实践道德的重要性次于超越的观念世界。“善”的观念世界现实化为具体的社会组织——城邦。在柏拉图式的城邦中,城邦是由平等部分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理想的城邦是由智者管理的哲学王政体,最优良的生活是城邦的终极指向。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共同体内,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城邦满足成员的需要,人类的生活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共同体。然而,这一共同体不是以某种政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而是以人自身的生命存在、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基于此,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消灭政治本性的共同体,即在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时消灭无产阶级自身,进而消灭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存在的原则。柏拉图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间存在着间接否定性的必要关联。马克思超越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共同体的具体运作方式,将其转化为一般社会运行原则和客观道德要求,进而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原则遵循。

第二,美好生活的规定葆有共产主义因素。亚里士多德以“活动”、“劳动”和“反物质第一性思维”作为美好生活的规定,为马克思设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提供思想借鉴。一方面,“实践”、“工作(劳动)”和“活动”等概念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式美好生活的向

度。从亚里士多德规定的美好生活样态来看,幸福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同意语。但是,亚里士多德规定的幸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人的实践活动。幸福的生活是合德性的生活,合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于消遣^{[4]304}。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否认消遣构成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设定中,消遣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非生活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反财富(物质)第一性思维”是亚里士多德规定美好生活的另一维度。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视角中,财富不是城邦建立的核心追求,亦不是美好生活的解释原则,更不是人性的真正表达和体现。“牟利的生活是一种约束的生活”^{[4]12},是反自然、反本性的。因此,财富不是美好生活的终极最高目的,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手段”^{[4]13},即是说,从“人”的视域出发考察财富(物质)的本质,其仅仅是工具性存在而非目的性存在,是从属人而非超越人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通过劳动定义美好生活,在于其看到“实践的生命活动确定着人的种属的可能性的范围”^{[4]译序Ⅲ},使美好生活有现实的倾向和可能;亚里士多德通过扬弃“财富规定生活”的庸俗观念,使城邦公民过上好的生活、有德性的生活,也就是高等人的生活,这为马克思构想先进性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现实参照,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摒弃“物质第一性”的单一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批判地论及亚里士多德”^{[5]33}。亚里士多德设定的美好生活是一种政治价值、规范性的公共价值,是一种被共同体成员认同和赞许的价值,因而美好生活不是由公民自身的情感或者感受确定,也不是以个人的道德偏好为判定依据,是有别于“从人本身出发”的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卢梭的公意共同体主张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成形提供政治指向。卢梭倡导建构的共同体是由自然人演进为文明人而组建的公意共同体。从公意共同体建立的逻辑起点、组建的原则遵循和构建的组织方式考察,这一共同体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质,是政治的共同体。从建立的逻辑起点来看,卢梭的公意共同体是以公众利益为依归。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因现实条件局限未能规避现实生存困境,因此,消解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影响人类生存的阻碍力量成为公意共同体形成的驱动力。从建立的原则遵循来看,卢梭的公意共同体以特殊的宗教自我主义为组建原则。宗教自我主义主张单个人把自身作为与其同类是形同一体时应表现出博爱精神。从建立的组织方式来看,“订立契约”是公意共同体的形成路径。契约签订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公众的基本利益,采取“让渡自己的权利”的方式,即每个成员及其自身的一切自然的、天赋的权利全都转让给整个的共同体,进而形成一种“力量总和”来保障全体公众利益。“在这一共同体之中,个体的自然权力并未丧失,而是在道德内容上得到升华、美化和丰富。”^{[5]61}正基于此,卢梭将公意共同体称之为“完美的共同体”。

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是卢梭公意共同体思想的回声。追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缘起背景,解读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语词表达,直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某种程度来说,卢梭的公意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得以回响。这具体体现于:其一,价值设定。卢梭式的共同体“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6],以保障自然人或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原初状态。马克思的共同体,是保障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其二,终极目标。卢梭的公意共同体强调,“所有成员应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为国家服务”^[7]。马克思的共同体强调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人自身服务。马克思共同体的实质是在消灭了阶级差别与异化分工条件下,由掌握发达生产力的自由个体联合而成的真实共同体。其三,卢梭的平等思想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得以回响。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平等是调整社会阶级结构、消弭教育差别和消除社会认知差异的必要存在,坚持自由平等原则是联合体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实现共同体成员经济平等、社会地位平等和享有选择平等的保障,是人实现终极归属与解放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对卢梭公意共同体思想的扬弃和超越。其一,从整体性视角统揽卢梭的公意共同体思想,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强者对弱者进行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基于此,德拉·沃尔佩指出,卢梭的共同体是“毫无想象力的虚构”^{[8]187},恩格斯则作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9]的批判性论断。其二,卢梭式的平等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抽象的和法律上的平等”^{[8]12}。公意共同体由自然的、抽象独立的人同社会肌体结合起来构成,每个成员及其自身一切权力转让给整个共同体的前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德拉·沃尔佩看来,这只是“暂时的历史的有机体”^{[8]11}。其三,公意共同体关照的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自私的,从根本上疏远和排斥共存“政治人”,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3]40}。

然而,内含理想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的马克思共同体,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和绝对的“政治人”,而是参与社会历史活动的、具体的人;注重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群体的解放,而是致力于整个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是恢复人本真状态、改变人存在形式的社会形态。内生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平等不是乌托邦式的和普遍的平等,是内在的、现实的实质性平等。建基于物质商品共享体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照的不仅仅是人的基本生存困境,而是更注重人意识层面的满足和共享。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可见,马克思构想的可预见、可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卢梭公意共同体思想的拓延和超越。

第四,德国古典哲学“共同体主义转向”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萌生提供思维启发。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促成现代人主体性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主义逐渐发展为西方人解释世界的一般原则和具体规范。启蒙理性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笛卡尔对人主体性的全新阐释和理解——“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是个体主义成为人的思考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具体延展。然而,康德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部分地显露其共同体主义思想倾向。在康德的哲学思维中,其不是对共同体进行制度设计和内容规定,而是探讨共同体何以可能并提供了解决路径,即是人具有的理性能力为人与人之间交往提供可能,为共同体的建立提供现实可能性。人的理性能力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具体表达其对自由的探讨,因而康德式共同体主义倾向也即是自由共同体。

自康德后,从费希特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呈现出从个体主义向共同体主义的范式转变。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的完成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实现“共同体主义转向”,这一范式转变与其承认思想紧密联系。费希特式共同体主义预设了法权-伦理共同体中人的先天的自由和理性,在其看来,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的互相承认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当有限理性存在者把自身设定为在与其他理性存在者的关系中自我限定和相互承认的个体时,才能够意识到自身是自由地发挥效用的存在者。个体只有在重构自我-他者的社会关系中,抑或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单个人的理性和自由,因为“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10]。

藉以对自由的探讨,康德和费希特阐发其共同体主义思想。在康德的哲学视野中,自由内在于道德领域之中,而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中,自由外化于法权领域中。可以看见,从康德到费希特,自由进行了“从内而外”的运行轨迹,自由的“外化”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达至巅峰。一方面,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如何实现自由的探讨阐明其共同体思想。在黑格尔的精神体系中,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表现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过程,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表达为绝对精神的自由,因此,人类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遵循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共同体是绝对精神在追求自由的进程中外化的必然产物”^[11]。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承认学说也葆有共同体主义因素。黑格尔主张继承费希特的“承认”观念,强调用“主体间性”社会关系范畴取代单子式个体主义概念,作为阐明社会共同体高级形式的解释性原则。黑格尔凭借“自由”和“承认”概念对共同体所作的阐发,无

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尚显素朴的共同体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共同体主义的探讨和阐发,无疑构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因,深刻嵌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然而,这一哲学派别是从先验理念出发进而构建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从“人”的概念自身中先天地、逻辑地推演出来,是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无论是康德、费希特,还是黑格尔,都仅仅把共同体设定为自由在道德、法权或精神的活动空间,因而具有空洞虚幻性。马克思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洞察到该哲学派别的理论缺陷,在扬弃其抽象性上丰富自由的本真涵义,并进一步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真正共同体的独特标志。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理想憧憬、价值探讨和旨归设定,充分彰显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特质。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时代理论回声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国现实发展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超越“物种思维”的局限性,从人类发展现实出发,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以高度的担当精神深入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关乎人类未来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时代问题,作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牢固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新要求、新任务和新目标,并不断用“命运共同体”思维模式解决一系列现实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进步一边的正确选择,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跨越和理论范式创造性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赓续。

在马克思之前或与马克思同时代,已有大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共同体”概念进行学理性研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12]译序Ⅲ},是由所有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构成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2]54};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丰富了滕尼斯的观点,强调了共同体的排他性特征;雷德菲尔德在研究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村部文化时,将共同体界定为某种“同质性”的共同体。共同体思想未局限于马克思任何单一文献中,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科学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特点,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的重要思想,作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论号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成为全面实现的人的各种能力的第一需要”的社会;在《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共同体”,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源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状态。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阐发、关于共同体思想的表述,在当前中国产生了有影响力的理论回响。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非排他性思维”的理论回应。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各民族隔绝现象被全球化和现代化打破,“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13],随着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推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538}。因此,“偶然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市场”成为“世界市场”以及“交往”成为“世界性交往”的世界格局逐渐生成,并成为马克思建构“非排他性思维”的现实基础。“非排他性思维”体现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政治诉求是“非排他性思维”的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理论思维的非排他性和包容性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的不是某一民族、某一

地域或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是超越个体视域,把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旨归地,以发展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解决世界人民面临的国际社会难题,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14]。“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和“为世界谋大同”的胸怀是马克思“非排他性思维”的具体理论表达。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整体性思维”的理论回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饱含整体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保障“类主体”利益、恢复“类主体”的本真状态和达至“类主体”解放是“真正共同体”之“真”所在。正是在这一理念遵循和价值观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作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5]的人本命题、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6]的人本论断,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切实贯彻改革为了全体人民、发展为了全体人民的科学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刻蕴涵着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优先的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注脚。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17],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不平衡发展”的主要矛盾、消除当前“不平衡发展”的社会现状,以破除阻碍各民族融合交流的物质界限,从而为实现各民族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解决重大问题和制定一系列政策制度上始终坚持民族立场、贯彻以全民族利益为中心、切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最大的发展之一,也是创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统一性思维”的理论回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葆有统一性意蕴。马克思对自然共同体的论述以一种自然生动的方式表征了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是互为依赖和前提的统一体。然而,自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对物质财富丰富性和完满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消解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意识,并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科技成为人攫取自然资源的工具性存在,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在某些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发展失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显现。极端气候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等生态恶性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的生存现实出发,从当前的生态发展事实出发,作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7]的科学判断和全新要求,强调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和发展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逻辑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特色”“现代化”实践表达为中国在前进过程中始终追求生态健康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并在具体建设实践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为原则遵循,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构建的全新生态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统一性思维”的延宕。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呈现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这一魅力一方面理论表征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一系列论述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具体的理念主张,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产物;另一方面实践表达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之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都彰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建设性功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 黄学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与融合: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未来社会思想[J]. 哲学研究,2022(2):26-34.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5] 伯尔基.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 伍庆, 王文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6]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9.
- [7]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 李常山,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58: 188.
- [8] 德拉·沃尔佩. 卢梭与马克思[M]. 赵培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92.
- [10] 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 梁志学,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8.
- [11] 胡寅寅. 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致思逻辑研究[M].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6: 26.
- [12]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3] 乔瑞金, 等.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69.
- [14]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4.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00.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89.
- [17]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 人民日报, 2021-08-18(1).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in the New Era

XIANG Qian-mi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has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It puts forward a unique approach and principle for us to solve the current major issues in the world.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hich still attracts wid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a.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tren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r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reality and logic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y, namely, the Plato-Aristotle's thoughts of city-state community, Rousseau's theory of community of general will, and the communitarian shift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re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s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Marx's theory of community has enriched and surpass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hought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contemporaries, which has advancements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ty though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life community

〔责任编辑:朱 根〕